

“双一流”是什么都能装的“筐”?

■本报记者 王之康

前不久,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其实,“双一流”建设自首批名单公布,由战略决策转入真正实施以来,这早已不是第一次有其他内容纳入其中。此前,某高校就提出,要把思政课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纳入“双一流”建设重点任务;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要把宁静的校园纳入“双一流”建设指标。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今后,是否还有类似科技成果转化、思政课这样的内容纳入“双一流”建设,目前尚不得知,但这一势头却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种政策引导

说到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其实在名单公布之前的2016年8月,教育部、科技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早已明确提及,“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可以说,这次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方案,只是对上述文件的一次地方性落实和尝试。

“它主要还是针对北京的部分高校,并不能够作为对全国高校的要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支持,不应该只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来做,所有有关高校都应该重视起来,因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中国乃至国外高校的共性问题。

在他看来,高校毕竟不是产业部门,教师们更擅长做科研而非转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低。“这个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引导,因为考核就是一种评价,评价就是一种引导,引导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该方案中的这一规定体现出了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即向社会宣告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资源配置的方向在哪里?”操太圣说,具体来讲,就是告诉那些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要关注此问题,并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落实,否则可能影响到后期的评估结果和进入下一期的“双一流”建设。

不过,操太圣认为,科技成果转化有其学科与专业属性的要求和限制,将来在评估时如何兼顾不同高校学科差异性,特别是那些以人文社科专业见长的高校不至于因为这一评价指标被打入另册,也是需要提前预见的。

可以想见,在“双一流”建设中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作为一项考核指标,势必会激励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起到促进科研驱动经济产业发展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案是有积极意义的。”别敦荣说。

既然如此,是否类似内容都可以纳入“双一流”建设呢?答案是否定的。



瞄准世界一流

“双一流”建设本身有一个特殊的界定,即“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中国特色’讲的是特征,‘世界一流’讲的是水平。‘双一流’建设追求的是世界水平。”别敦荣说,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不应该是一般的科技成果转化,而应该是追求世界一流、能够引领中国产业发展的成果转化,也就是高科技成果。

他认为,不能泛化为什么都可以纳入进来作为考核指标,还是应该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发,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角度,考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社会服务等。“一切的一切都要以‘世界一流’为中心,如果脱离了世界一流,就可能误导‘双一流’建设。”

在操太圣看来,“双一流”建设在本质上还是办教育,因此,还是要回到办大学、办学科的本源上思考,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引领社会发展的各行业精英为职志。

“实践中,‘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可以看做是市场力量对大学发展提出的要求;‘重点建设思政课’更多地反映出党对合格接班人培养的关注。”操太圣说,从我国教育的社会本位特点来说,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其同时也提醒人们,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遵循教育规律相结合,加强高校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能力建设,做到教育的‘四个回归’也非常重要且紧迫。”

而对于瞄准世界一流而进行的“双一流”建设的现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对于一流大学来讲,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才培养和一流的学术成果。”熊丙奇说,我国如今在

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视度并不够,考核时往往以规模和体量来代替质量,比如研究生的规模,而实际上,一流人才培养是与学校整体的课程建设、推进完全学分制教学、实施通识教育、关注创新人才培养等密切相关的;对于一流学术成果,我国特别重视的依然是论文,关注的是课题经费,主要在乎的是规模和体量,并没有真正去关注学术的创新价值。

分类考核评价

实际上,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的方案,“如果前提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某类或某几类高校的评价指标,则体现了我国高校分类管理、分类评估的思路,而其落脚点又是对教师的分类管理与分类评价”,操太圣说。

今年2月,中办、国办曾联合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于高校教师中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要“突出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因此,其研究项目必须面向和满足市场的需求,成果转化也就自然成为研究工作中的必需环节。

“而当前,我国还是以行政主导的评价为主,它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功利色彩,强调政绩观,这反而可能会导致学校的办学形式主义,甚至可能为了达到指标而弄虚作假。”熊丙奇说。

其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早就明确提到,对高等教育要淡化行政评价,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

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

对于我国现在推进的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的改革措施,熊丙奇认为,核心其实并不是如何对学术型人才或教学型人才分类进行评价、设置不同的评价指标,关键是要建立同行评价机制。比如,一所大学里实行教师同行评价,教师们开展教学或学术研究,很自然地就会根据其自身的教学任务或学术研究成果,按照教育的标准和学术的标准来评价其教育能力、教育贡献以及学术能力、学术贡献。

“如果还是坚持行政主导而非同行评价,即使是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也依然是由行政来分类,分类之后还是由行政部门来确定评价指标,而这样的评价指标可能又是表面化的,甚至可能会政绩化,结果导致大家为了达到指标而产生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熊丙奇说。

在别敦荣看来,中关村管委会与“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界定清楚。中关村管委会应该做或能做的既不是行政也不是评价,而是激励和支持。与中关村管委会职能相关的高校都不是它所属的,它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相关治理活动,与“双一流”高校开展平等、双向的共建活动。

一个系统工程

熊丙奇认为,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改革。“就是要推进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改革,并且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才是建设‘双一流’最核心的改革。”

对此,操太圣深以为然。

“‘双一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很多方面和层次的问题。”他说,在切实落实管办评分离和政府“放管服”等教育政策、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前提下,最重要的还是高校自身的能力建设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高校要有前瞻性的办学理念 and 人才培养目标、致力于理念和目标落实的现代大学制度、功能健全的组织结构、具竞争力的教师队伍、宽松开放的组织文化、足够的经费支持、支持性的组织领导等。“只有将以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大学才能真正承担起创建世界一流的责任和使命。”操太圣说。

在熊丙奇看来,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向学校放权,然后学校自主办学。“这实际上是推进学校的管理、评价去行政化,让学校真正能够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发展。”

“另外就是学校内部必须推进现代治理。”他说,简单来讲,就是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必须分离,要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学术管理、学术评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让学校能够坚持其本身的办学定位,形成学校办学特色非常重要的方面。”

熊丙奇认为,如果不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改革,“双一流”建设可能还会停留在概念上,无法深层次地真正推进高校一流人才的培养和一流学术研究成果的诞生。

现场

“想学游泳,要先入水”

——记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

■本报记者 张思玮

“1、2、3、4……”一阵阵急促的声音,飘荡在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体育馆的上空。

两位身穿白大褂的参赛选手正在对一个心脏骤停的人体模具进行心肺复苏(CPR),一位选手负责按压并数着次数,另一位选手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而第三位选手正在紧张地学习除颤仪(AED)的使用,并对患者进行除颤。旁边有两位身穿红色马甲的裁判员仔细地观察选手的操作流程,并进行评分。

这是首届全国大学生公共卫生综合技能大赛上的一个场景。此次大赛共有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31所设有预防医学专业的高校组队参赛。每支代表队共有4名选手参加,其中1名选手作为替补。

“公共卫生专业的队伍就像一支军队,我们全国二十几万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的组织队伍,天天与传染病在作艰难斗争。”教育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此次大赛总裁判长李立明表示,通过比赛试图缓解高等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同时要促进临床和预防的有机结合,来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就好比学游泳,一定要先入水。”

公共卫生应面向百姓需求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这足见国家对预防医学的重视程度,而公共卫生或预防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势必会成为践行“预防为主”的主力军。

“如何将我们的高校教育与国家需求、百姓健康需要相结合,是我们一直思考的事情。”李立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公众的健康是老百姓最关注的,也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百姓的健康能不能得到保障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公共卫生专业队伍能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样的健康服务,怎样帮助老百姓提高健康素养,养

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尤其在当前“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指引下,如何通过教学改革,使得高校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更好地服务“大卫生”“大健康”的理念,成为医学类院校共同思考的问题。

“所以,此次比赛主要让学生通过利用现有的综合知识,处理公共卫生事件中遇到的问题。”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表示,比赛可以将书本教育的“死”知识,综合灵活地运用到模拟实践中,从而促使学生具备现场处置能力,更好地提升整体素质。

重在考查应急处理能力

鉴于此,此次比赛共设置初赛和决赛两个环节,上午的初赛主要采取“站点式考核”形式,考查参赛选手对于临床和公共卫生基本操作技能的掌握,每队选手依次进入4个站点,分别进行“临床基本技能”“个人防护”“样本采集和现场检测”“卫生处理”操作。

根据初赛成绩,筛选出11支队伍(其中,南京医科大学选手晋级决赛但不参与排名)进入下午的决赛,参加公共卫生基本理论测试和案例分析考核。

“初赛每道题的题干都是一个突发事件,但考查的大多是最基本的操作。”南京医科大学国家级预防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此次大赛题库专家倪春辉表示,四个站点其实涉及四个不同的公共卫生事件场景:公共场所的现场急救、医院疑似禽流感患者的生物样本采集、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的水样采样和皮肤炭疽病流行工厂车间的消毒。所有站点都要求选手之间相互配合。为了了解学生基本技能全面性、应变能力及分析能力,第二、三、四站还设置了围绕该站考核内容的书面题。

作为医学生,首先要具备救命的技能。为此,第一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个场景:在公共场所有人突然晕倒,需要进行CPR,同时还需要现场学习AED的使用。在考核学生急救能力的同时也考核了学生实践学习能力。此外,在急救成

功后,还设置了患者家属感觉头晕、心慌的场景(由标准化的病人扮演),考查学生问诊、量血压和心脏听诊等基本的临床技能。

“有的学生在心脏听诊前能先消毒双手后,再焯热听诊器,还会对患者说‘有些凉’之类的关心话。但是有的学生则做得不够好,例如在心脏听诊完毕后,患者还一直盖着衣服,并没有嘱咐或帮助患者系扣子。”倪春辉说,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但是却能反映出医者仁心。

第二站模拟的是一起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选手要去医院病房采集疑似禽流感患者的生物样本作进一步检测以明确诊断。这是四站里最难的一站,首先要选择正确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口罩需要从多种类型里选出正确的,如何正确穿戴防护服、口罩、手套等,以保护自身安全。另外,还要要求学生对患者(模拟人)进行咽拭子采样,这部分虽然所占分数比较少,但是各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

第三站包含两个内容,第一个考试场景是:某地发生突发水污染事件,要求选手采集用于微生物、化学耗氧量检测的水样。另一个项目是检测紫外灯紫外辐射强度。这站不难,但内容比较多,选手如果不熟练就不能按时完成。

第四站则是某车间发生皮肤炭疽病流行,要求选手前往这个车间进行终末消毒。这站的内容不多,但是选手之间相互配合很好的队不多。

“每道题都具有突发性,这也符合公共卫生的特点。”李立明表示,在突发情况发生的现场,选手不仅需要应急处理能力,也要有团队协作意识。

摸索实践教学的模式

“上课的时候觉得挺简单的知识,没想到在比赛中就容易慌。”南京医科大学参赛选手下立军说,因为比赛有时间限制,再加上有点小紧张,



参赛选手正在对人体模具进行心肺复苏。

所以他在制作消毒喷雾剂时,手套不小心勾破了,“立马重新戴上了一只”。

的确,相比其他学科,医学教育的实践性非常强。“高校在课程设计方面,教育部会有一定的标准,以期让学生能够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但是到具体的实践或实习的过程中,却缺少统一具体的标准。”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此次大赛总指挥胡志斌表示,此次大赛考查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与行业的对接。

比如,大赛邀请江苏省的一些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以及医院的医生参与出题、裁判等工作。“这将促进高校教育与行业需求联动,也能为高校的教育课程设计与实践课程的安排打开新的思路。”胡志斌说,以后可能将实践教学作为必修课在医学院校推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的结果并不是以学校名字公布,而公布的是入场抽签的编号。

“我们希望淡化比赛的结果,让学生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到实践能力的重要性。”李立明说,这就好比一支军队,只会纸上谈兵,不会真刀实枪的对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中国大学评论

在近日举行的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强调,要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等,并且表示一旦发现这些行为将严肃处理。这一禁令是完全可以让人理解的,因为每年围绕“高考状元”都会发生很多有争议的事情。然而,在对此表示理解的同时,笔者却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禁令,甚至担心在某种层面,这样的禁令可能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

首先,从高考的功绩谈起。高考在我国的功绩有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绩是让弱势阶层的子女有较大概率实现自身社会阶层的上升,进而促进社会流动。如果不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那么宣传高考的什么能让基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感受到高考改变命运的功绩呢?如果基层家庭很难对高考实现社会流动的功绩有简单、直接的认识,会进一步滋生学习无用论,这会令基层家庭更难通过高考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进而会加剧目前普遍担忧的社会阶层的固化。

其次,禁止宣传“高考状元”有悖于中华传统文化。“金榜题名”是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津津乐道的重大事件,“金榜题名”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公开地、高调地宣传高考状元。有这样一个论点,认为中国人对教育的信仰和西方人对宗教的信仰类似,对教育的信仰,对“金榜题名”的渴望促使中国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保持着尊师重道、爱学乐学的传统。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思想文化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正确的思想不去占领,错误的思想就会去占领。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宣传战线。如果禁止宣传被广大老百姓和中小学津津乐道的“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相应的宣传阵地就更容易被娱乐、八卦甚至更为负面的新闻所占领。久而久之,尊师重道、爱学乐学、艰苦奋斗的传统文化可能就会被各种反智思潮所侵蚀。

其实,宣传“高考状元”不但中国人民喜欢,国际友人也同样认为是一个好的举措。10多年前,笔者在英国诺丁汉进行博士后研究,了解到在英国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当地新闻记者也在宣传当地的高考,也会采访当地的高考状元。据笔者的访谈,当地民众对此是颇为欢迎的。而这种宣传高考、宣传高考状元行为的历史在当地并不长久,据说还是借鉴华人的经验才慢慢流行起来的。

当然,笔者也深知近年来宣传“高考状元”的确有很多过火行为,间接引发了一系列负面行为,招致了很多社会反感。然而并不能因此就简单禁止对“高考状元”的宣传,而是应该想办法降低这些和“高考状元”相关的负面行为。其中,和“高考状元”相关的一个重要负面行为是“抢状元”。

然而,“抢状元”是可以通过的方案进行解决的。比如恢复原先的出分前填报志愿而非出分后填报志愿。笔者在几年前曾经同在当地施行出分前填报志愿地区的某个“状元中学”校长交流过,他当时表示,因为是出分前填报志愿,所以尽管在填报志愿前,有多所高校来找过该状元作了宣传和动员,但“动静都不大”,更没有引起“打架”,学校也比较好办,只要简单配合高校的宣传即可。

某知名网站曾有人专门讨论“考前填报志愿”“考后出分前填报志愿”和“出分后填报志愿”的优劣,有网友认为,考前填报志愿的方式才是最“公平”的。因为这种方式最能反映考生的真实水平。通过高考前的多次模拟,考生基本能知道自己的水平,如果某个考生平时很稳定的话,即使高考发挥稍有失常少考了几分,也能报上与他水平相对应的学校。因此,那种一贯成绩优异、自信的考生更能够在出分前填报志愿的制度下脱颖而出,而有效减少了一些一贯成绩优异的考因为高考成绩差了几分而失去进入与自己水平相当的高校就读的机会。

而且,出分前填报志愿还有利于状元在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分布,有助于更多高校的“双一流”建设,避免状元都扎堆在热门专业,有助于减缓目前“逃离工科”的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鉴于高考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功效,社会上普遍担忧阶层固化的情况,非常有必要通过“宣传状元”“宣传升学率”告知基层民众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鉴于目前社会上时常出现的学习无用论、反智思潮,抱着千金买马骨的态度,笔者认为,不但应该禁止“宣传状元”“宣传升学率”,相反,还要适当地加强相关宣传。针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行为,要有针对性地分析,加以精准解决,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更不能简单禁止“宣传状元”。否则,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更加长久。

对「高考状元」也应做适当宣传

■李锋亮